

祝允明〈七悲文〉中的吳中士不遇書寫

王達甫*

(收稿日期：114年12月18日；接受刊登日期：115年5月8日)

提要

在祝允明的創作中，〈七悲文〉具有鮮明自況色彩；然而，若僅從晚年失意來理解此文，仍不足以說明其篇章結構與主旨遞進所表徵的思想層次。本文將其置於祝允明久困春官、正德九年前後棄舉赴選的生命關節中重新考察。以此指出，〈七悲文〉之「悲」不在爵貨得失，而是藉悲道、悲志、悲學、悲時命、悲余先、悲黨與悲文章等七目，展開祝允明對科舉價值、先德承繼、同道歸屬與文章傳統的詰問與反思。此一書寫實踐既承接騷體餘緒中的發憤抒情傳統，又在「余何歸乎」的追問中，將憂憤轉向文章歸處與自身位置的重新安置。

由此可見，〈七悲文〉不僅是理解祝允明棄舉赴選心境的重要文本，也呈現吳中士人在科舉遲滯下，如何透過地方文藝資源與文章書寫維持自我價值，繼而開展明代士不遇書寫的別樣安頓路徑。

關鍵詞：祝允明、七悲文、士不遇、吳中、科舉延宕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一、前言

祝允明(1461-1527)江蘇長洲人，祖父祝顥(1405-1483)與外祖父徐有貞(1407-1472)均為進士出身，自幼便領受致仕後的祖父親炙。在深厚的家學與期待下，以科舉躋身士林之路幾是必然。然而，自20歲補廩膳生起，歷五次鄉試才中舉(1492, 33歲)，七赴春官未能及第的祝允明，於正德九年(1514, 時年55)赴選廣東興寧知縣。¹祝允明的科舉經歷正闡明了他在正式入仕前，已在此途上歷經長達35年的遲滯。羅宗強明確指出祝允明在創作主題上有著「徘徊于入仕與世俗之間」的傾向，55歲棄舉赴選的決定，更是因受其子祝續(1479-?)於正德六年(1511)登第並入選庶吉士的影響。身為人父，在對兒子感到驕傲的同時，亦生成時運不濟的複雜怨懟，正德七年(1512)前後產出了許多質疑自我、深思仕途的作品。²

與科舉失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祝允明在江南藝林中聲名遠播。《明史》稱：「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稍長，博覽羣集，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³可見祝允明年輕時即以文采、書道享譽吳中。然而，正是這位以詩文、書法名重一方的文士，仍得長期面對功名未成的現實壓力。此種「名高而身滯」的反差，使其書寫不僅是個人情感的表露，也成為回應自身制度位置與生命處境的重要方式；其經年不遇與反覆回歸考場的曲折，亦具體呈現明代士人對「士不遇」處境的理解與調適。

對於「士不遇」，顏崑陽指出，此一傳統所呈現的「悲」，並非單純情緒宣洩，而是關涉士人之才志、時命與社會回應之間的落差。隨著科舉制度逐漸成熟，士人的不遇經驗又更常與功名進退、制度位置及個人生命時間相互交織，遂使「悲」由政治理想與時世失序之感，進一步轉入個人仕進受阻後的自我反思。⁴然而，若僅視其為功名之悲，則忽略了士人在反覆不遇中「重理自我」的歷程。以祝允明為例，學界雖多以其子登第、本人赴選等事件說明其心態轉折，卻鮮少著眼他如何在棄舉之際，以書寫辯證自我。⁵徐慧曾從詩歌與科舉經驗對比其「仕／隱」觀的變化，指出其心態隨生命階段而遞變，留下一定的

¹ 陳麥青：《祝允明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3-16、116。

² 羅宗強：《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91-193。

³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86，列傳174「文苑二」，頁7352。

⁴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頁249-250。

⁵ 閻繼翔將祝允明一生分為：「求學、科考、仕進、閑居」四期，其中「求學」與「科考」兩期幾乎貫穿其成年後的大半生命，足見入仕問題非偶發挫折，而是長期牽動其自我定位與書寫心態的重要因素。閻繼翔：《撕裂的兩極：祝允明的人生與書法》（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2018年），頁20-21。

探究線索。⁶本文據此進一步主張，若欲理解祝允明在棄舉與赴選之間的深層思索，當以〈七悲文〉為關鍵文本。⁷主題「七悲」正是對生命難以輕忽的苦痛的刻畫，鋪陳並自道際遇之悲，為祝允明作品中具鮮明自敘色彩與身分意識的作品之一。從其遣詞與敘事方式觀之，此文正可置於祝允明歷經數度會試落第、深感年歲迫近與仕途受阻的脈絡中理解。文中屢見「志不行」、「命不通」、「名既不立」、「身且日損」等語，顯示其在長期科舉挫折後，對自身處境與命運感受的深切反思；同時亦可由此觀察吳中士人在仕途受阻之際，如何重新思考功名、文章與自我位置之間的關係。

〈七悲文〉雖無明確繫年，然其所呈現的時命、年歲、志業與文章歸處之思，與祝允明由會試轉而赴選的處境頗能參照。此文以「悲」為體，七章遞進，不僅回應其生平遭遇，也呈現其身分意識與價值判斷的調整過程。同時，該作在語勢排比、反問與感歎兼具的特徵上，頗近騷體餘緒；然基於祝允明並非有意與屈原（B.C.342-278）對話，⁸本文更傾向將此作理解為借辭體以抒情、遣悲懷之作。〈七悲文〉所呈現的思索與掙扎，正在於祝允明如何在仕途未竟之際，透過文學書寫進行自我安置。然迄今尚無針對〈七悲文〉的專文探究，本文以為，此作題旨宏富，語勢兼具哀感與思辨，不僅可視為祝允明仕途未遂後的自我辯證，也有助於觀察明代吳中士人在功名、文章與自我位置之間的調整方式。

同時，祝允明常自稱「吾吳人」、「吳郡祝允明」⁹，其書寫中可見鮮明的吳中自我意識。本文所稱「吳中」，並非泛指所有吳地士人的集體心態，亦非籠統標舉地域文學風格，而是以明代蘇州、長洲一帶文人所構成的地域文化網絡為核心。依范宜如對明清江南文學活動與地域文化空間的觀察，「吳中」相較於狹義地理界定，更可視為一種隨文學活動而伸縮的文化空間；其範圍不僅涵蓋地域出身者，亦包括參與其文化網絡的士人群體。¹⁰此

⁶ 徐慧：〈從祝允明詩歌創作看其仕隱觀的轉變〉，《中國韻文學刊》第23卷第2期（2009年6月），頁21-22。徐慧：《祝允明文學思想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44-245。徐慧由祝允明精神認同討論至詩歌觀念，本文將在此些認識上進一步以「士不遇」文學主題延展祝允明在明代文學與文化中的意義。

⁷ 明·祝允明著，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9，頁176-178。現存以薛維源所編《祝允明集》為通行底本，另有張明晶點校本，兩者在句讀與語勢的理解上差異頗大。本文以薛本為主，兼參張本對讀，以避誤讀。明·祝允明著，張明晶點校：《祝允明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3年），卷9，頁272-275。

⁸ 廖棟樑曾明確分野，若沒有刻意與屈原或點名與《楚辭》作品的連結，僅能視為「借體抒情」並沒有「楚辭學」的意義。基此分野，本文將〈七悲文〉置於士不遇書寫傳統中理解，但不刻意強調其在騷體上的繼承。廖棟樑：〈痛飲酒、熟讀《離騷》——簡論六朝士人對屈原的讀解〉，《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卷4期（1998年12月），頁71。

⁹ 「吳郡祝允明」即〈七悲文〉卷頭語；「吾吳人」詞條見《祝子志怪錄·水關》條：「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卷2，頁57。

¹⁰ 范宜如：《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4年），頁16-18、21-22。

一觀察提示本文：所謂「吳中」並非單純地域標籤，而是由地方出身、文藝交遊、書畫評品、城市生活與地域身分意識共同構成的文化語境。

因此，本文所謂「吳中士不遇書寫」，並非指吳地士人具有某種固定不變的集體心態，而是指祝允明這類名重吳中而久困春官的文士，如何在科舉遲滯與仕途不遇之際，借助吳中文藝生活、交遊網絡、地方聲望與歸返想像，重新調整自身位置。此一語境一方面承受士不遇傳統中才志不伸、時命不偶的古老命題，另一方面，又在明代科舉制度成熟與吳中文藝生活發達的條件下，形成較具彈性的回應路徑。士人即使未能透過進士及第取得穩定的制度位置，仍可藉由詩文、書畫、交遊、地方聲望與城市生活中的隱逸想像，維持其文化身分與自我價值。王征曾指出，祝允明無法完全拋卻世俗功名，卻又以莊子哲學消解紛擾，並欣羨陶淵明的隱逸生活；其對科舉與仕途壓力的回應，亦融入「吳中文人的詩意與快意」之中，是否高度參與宦途並非絕對條件。¹¹循此脈絡觀之，〈七悲文〉所呈現的並非單純的功名失落，而是祝允明在吳中文化語境中，將不遇之悲轉入道、志、學、時命、先德、同道與文章等層面的自我辨識，由此尋覓安身的位置。

據此，本文將結合祝允明的個人科舉經歷與〈七悲文〉內容，定位此文在其生命歷程中的位置，並探討祝允明如何藉由此作，回應長期應試、未能進士及第與赴選前後的心理壓力。此一討論並非僅將〈七悲文〉視為個人失意的自況，而是進一步觀察他如何在吳中文化背景下，透過七悲諸目的鋪排，理解自身在科舉、家族倫理及文章傳統之間的關係。黃卓越曾以「隱逸或隱寓性」界定吳中文士對仕進的態度：前者較強調仕進與退隱之間的倫理抉擇，後者則指吳中文人介於仕、隱之間，藉由文會、吟詠、書畫等文化活動寄寓其身的中介狀態。¹²本文借用此一觀察，說明祝允明在〈七悲文〉中並未單純宣告退隱，也未完全否定仕途，而是透過文章書寫安置其不遇之感。

綜觀既有研究，對祝允明仕途挫折與心態轉折的討論，多圍繞其科舉歷程、棄舉赴選的實際行動，或從詩文創作中歸納其仕隱觀念上的變化；然而，此類研究較少細論〈七悲文〉本身的篇章結構，亦較少說明其何以依序鋪排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目。本文認為，〈七悲文〉並非僅是回顧既往的情感表述，而是可置於祝允明中舉後久困春官、至正德九年前後轉向赴選的生命關節中理解；此文透過上述關目次第展開，由士人價值根基之追問，轉入家族、同道等倫理關係之重估，最後落於文章傳統中自我歸處的尋索。祝允明正是在此文中，透過對「悲」的層層鋪展，將仕途挫折所引發的自我懷疑，轉化為對可安身之處的重新尋索。

¹¹ 王征：〈明中葉吳中派隱逸風尚與陶詩接受——以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為中心〉，《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36卷第6期（2019年6月），頁43-44。

¹²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91-92。

具體而言，〈七悲文〉七目分別為悲道、悲志、悲學、悲時命、悲余先、悲黨與悲文章。就篇章次第而言，前三者多關涉士人價值根基，由〈悲時命〉開始，將此一追問轉入年歲、際遇與科舉遲滯之現實；〈悲余先〉所謂「余先」，指向祝允明對先德、家學與承繼壓力的反思，〈悲黨〉則以「黨」思考同道與精神歸屬；終篇〈悲文章〉回到文章與經史傳統，思考自身可歸之處。本文所謂精神、倫理、文學三層，並非將七篇機械分割，而是說明其悲感如何由價值根基之追問，經由家族、同道等倫理關係之重估，最後轉入文章傳統中的自我安頓。循此脈絡，本文將從〈七悲文〉的精讀出發，結合祝允明正德九年前後的書牘與赴選作品，觀察他如何在吳中文化語境中，透過文章書寫回應科舉延宕的處境，並重新確認自身價值與可安置位置。

二、〈七悲文〉由悲入安的篇章遞進

追索〈七悲文〉的篇章遞進，宜先由卷頭語揭示的「悲」之性質談起。祝允明並未逕以悲情自況，而是先辨明何種悲感足以成文：其所悲者，不在爵位、財貨之得失，而在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涉士人自我位置的重大問題。由此觀之，序言不僅交代創作動機，也為後文展開確立判準。下為其內文：

吳郡祝允明謂悲非丈夫氣，使氣而夫則已矣。茲其非夫而非自克者，寧能無悲者與？聊以其大者件而文之，不及爵貨者，非氣也。¹³

此段看似簡短，實為全文辨「悲」之關鍵。祝允明開篇云：「悲非丈夫氣」，先承認世俗多以為「悲」非大丈夫所宜；繼言「茲其非夫而非自克者，寧能無悲者與？」則轉向自我辨明：他既未能以大丈夫自居，也不能完全克制其悲，故不能無悲。由此可見，祝允明並未將悲感視為「氣衰」或「氣節崩解」後的自我放棄，而是承認悲感確實存在，並進一步追問其所以成立的根據。

關鍵在於：「聊以其大者件而文之，不及爵貨者，非氣也。」祝允明明言所書者乃「其大者」，且不及爵位、財貨之得失。由此可知，卷頭語的重點不在區分有悲與無悲，而在辨明悲感所由是否出於名利之私。若悲僅出於爵貨得失，則不足以稱其氣；若所悲關涉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生命關目，則悲不但可以成文，也足以呈現士人對自身

¹³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6。

位置的省察。換言之，卷首語為全篇建立了一項準則：此文所書之悲，不在個人名利的失落，而在祝允明面對科舉遲滯、年歲迫近與文章歸處時，對自身價值根基的重新辨識。

此外，作者自署「吳郡祝允明」，亦值得注意。此一署名固然可視為一般籍貫標示，但置於本文脈絡中，仍可與祝允明反覆自稱「吾吳人」的地域意識相互參照，提示〈七悲文〉的自我陳述並非抽離地方文化而生。祝允明所書之悲，既關涉其個人科舉處境，也可置於吳中文人面對仕途不遇時，以文章、交遊與地方文化資源調整自我位置的文化脈絡中理解。¹⁴由此觀之，此序文的核心，在於辨明「何者可悲」與「何以成文」。後文七悲遂可視為此一判準的逐層展開：祝允明依序檢視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目，使「悲」成為重新辨識自我位置的書寫線索。

（一）形上之悲：志與道未行的反思

卷頭語既已辨明此文所書之「悲」不在爵貨得失，而是關涉士人自我位置的重大問題，首篇〈悲道〉遂由「道」之不明起筆。祝允明以「悲」開題，在情感抒發之外，也將不遇之惑，推向價值根基的層面：當天地氣化、聖道流變與諸學分立，呈現難以統一的狀態時，士人如何確認自身依循之道，便成為第一層值得書寫之悲。下為第一悲，「道」之悲：

噫！鴻靈之解，一而萬也。繇豐趨漓，氣將人紛，世逐人移。斯秘也，其遂無完期邪？而又誰其停之乎？尼丘東崩，雙林西槁。明神靈真，浮游乎六宇，儒墨名刑，條樹乎千門。雖夫霄泉曠域，然而旦莫萬古矣，吾胡為乎傷心哉？日月星辰黃道開，山河大地經九垓。蒼衢曙沈沈，皇義安在哉？振古迄斯今，吾氣一何悲！¹⁵

〈悲道〉以「鴻靈之解，一而萬也。」起筆，寫天地初始之氣由一而萬的分化過程。「鴻靈」可理解為天地未分前的渾淪元氣，「解」則指其分化開展；「一而萬」不只是描述萬物生成，更暗示原本可統攝萬象的根源，已進入支脈散生的狀態。其後「繇豐趨漓，氣將人紛，世逐人移。」承此而下，寫道與氣由豐厚趨於澆薄，人心亦隨之紛亂，世道因人而遷變。¹⁶由此可見，祝允明於此所見，並非單一事件的失落，而是價值秩序逐漸分散、難以

¹⁴ 都軼倫曾對吳中士人群體指出他們長期徘徊於科舉考途遊走於「仕／隱」之間，如祝允明便充滿矛盾與不甘。家族的期待使他們即便不願意，也不得不參加考試或赴選出任官職，陷入仕途與個人志向的兩難境地。都軼倫：〈矛盾、空間與解脫：論明中期吳中文人的仕隱困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1期（2021年1月），頁120-122。

¹⁵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6-177。

¹⁶ 「漓」字：澆薄；淺薄。用同「離」。背離；喪失。何建明等：《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s://chardb.iis.sinica.edu.tw/char/15177>（臺北：中央研究院，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

復歸的狀態。因此他連發追問：「斯秘也，其遂無完期邪？而又誰其停之乎？」此處的悲感，正由對天地與世道人心之變的不可止息而生。

「尼丘東崩，雙林西槁。」分舉孔子與釋迦，東西對照，象徵儒、釋兩大聖人典範皆已遠逝，祝允明藉聖人不在、典範已遠的意象，寫出後世士人面對多重學說與價值歧異時的困惑。下文「明神靈真，浮游乎六宇，儒墨名刑，條樹乎千門。」則進一步呈現諸學並出、門徑紛歧的狀態；價值資源並非全然消亡，卻難以再被整合為單一而明確的依歸。故其悲並不在於「道」完全斷絕，而在於道已分歧，士人身處其中，難以確認何者可依。

末段「皇羲安在哉？」再度回望上古聖王與理想秩序之不可復見。「日月星辰黃道開，山河大地經九垓。」雖寫天地仍然運行，宇宙秩序仍具其廣大尺度；但與之相對者，卻是「蒼衢曙沈沈」的幽暗感，以及「振古迄斯今，吾氣一何悲。」的自我感受。由此可知，〈悲道〉並非單純鋪陳宇宙本體之思，而是將士人不遇之悲推至價值根基的層面：在聖人既遠、諸學分流、世道人心遷變之際，祝允明首先感受到的，是自身所依之道不再明確。此一「道」之悲，遂成為後文轉入「志」與「學」的基礎。

「道」所表徵的形上之悲，接引而出「志」與「學」兩重層面。當可依循的價值根基已顯得分散而難以確定，士人便須回到自身志向與所學之用，檢視其能否在現實中實踐。〈悲志〉所問者，是志向雖存而不得伸展；〈悲學〉所問者，則是所學雖可承繼而未必能見用。祝允明由此將悲感由「道」之不明，逐步推向個人修身、志業與學問實踐的層面。下為〈悲志〉之內文：

孝順洞穹壤，忠精裂山岳。萬善宅其一躬，千夫的其百行。日月出而幽蔀發，清風吹而煙霧消。化物與春澍均濡，肅已將秋霜並烈。河流之貫夷夏，萬折必東，黃金之蹈洪爐，百鍊不屈。珠沉淵而豈暗，玉埋泥而愈輝。卓哉往矣，悲乎尼之！¹⁷

〈悲志〉以「孝順」與「忠精」開篇，將「志」安置於孝、忠等儒家倫理之中。「洞穹壤」寫孝道通貫天地，「裂山岳」寫忠誠堅卓可撼山岳，皆用以凸顯志向之高遠與堅定。第二句「萬善宅其一躬，千夫的其百行。」則將此一志向落回個體之身：萬善聚於一身，眾人取法其行，顯示「志」並非空泛願望，而是須由身體力行加以承擔的倫理目標。由此觀之，祝允明此處所悲，正在於高遠之志雖可自守，卻未必能在現實中獲得伸展。

接續「日月出而幽蔀發，清風吹而煙霧消。」以光明破暗、清風除翳寫正道一旦彰明，幽蔽與煙霧自可消散；「化物與春澍均濡，肅已將秋霜並烈。」則一柔一剛，兼寫化育萬物與自我整肅之義。其後「河流之貫夷夏，萬折必東。」以河流萬折而終歸於東，喻志向

¹⁷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7。

雖經曲折仍有其所趨；「黃金之蹈洪鑪，百鍊不屈。」則以金經冶煉而不改其質，喻志節歷經磨礪而不屈。至「珠沉淵而豈暗，玉埋泥而愈輝。」更進一步寫德性縱被掩抑，仍不因此喪失其光。這些意象共同構成一種「志可受困而不可奪」的書寫邏輯。

末句「卓哉往矣，悲乎尼之。」以感歎收束，所悲者正在於此等卓然之志已難於當世伸展。而「尼」或可視為語助，用以加重收束時的感歎語氣。由全篇觀之，〈悲志〉所悲不在志之喪失，而在志雖堅定，卻難以獲得施展之地。此一層悲感，正承接〈悲道〉所揭示的價值根基之不明：當可依循之道已顯分散，士人便轉而確認自身之志；然而，志雖可自守，仍須面對不得行於世的困局。故〈悲志〉之後接以〈悲學〉，乃由志向之難伸，進一步追問所學能否見用。下為〈悲學〉之內容：

搏塗構室，謝享成矣。炙鴉紉裳，無廢師矣。扶皇王以定世，贊玄黃於不頗。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乎而有絕邪？覓之而遇其緒，抽之而能繼。擲而弗用，吁！誰之過與？¹⁸

〈悲學〉承〈悲志〉而來，進一步追問「學」何以可繼、又何以不得其用。篇首「搏塗構室，謝享成矣。」以搏泥築室為喻，寫學問須由基礎處逐步營構，不能憑空而成。「謝享成矣」則可理解為對既成之業的承受與感念，顯示作者自知其所學有所承繼。次句「炙鴉紉裳，無廢師矣。」語義較曲折。「炙鴉」可聯想《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鴉炙」¹⁹之典，帶有貪求未得、先計其利之意；「紉裳」則可旁通楚辭香草修飾之義，²⁰含有修飾其身、自持其潔的意味。二語並置，使此句兼具警惕與自勉：學問之路可能受功利之念牽引，故更須透過修身與師承加以約束。

「無廢師矣」一句，承接前文而轉入師承問題。祝允明所重者，不只是個人學問之成敗，也包括所學是否仍能有所依循。下文「扶皇王以定世，贊玄黃於不頗。」進一步將學問之用推至輔佐治世、參贊天地的層面。換言之，在〈悲學〉中，「學」並非單純知識積累，而是與治世理想、價值判斷及自我實踐相連。正因其原本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後文「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乎而有絕邪？」²¹才顯得格外沉重：可承繼、可用世之學，竟也可能在世間遭逢斷絕。

¹⁸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7。

¹⁹ 戰國·莊子著，王叔岷撰：《莊子校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頁86-87。

²⁰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矯，直也。五臣云：『矯，舉也。』舉此香木以自比。」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臺北：頂淵文化，2005年），頁13。

²¹ 「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乎而有絕邪？」或可至邪間為一問句，可不逗斷。然查薛維源、張明晶二版本均於此斷，且祝允明行文之文氣多以「悲乎」為轉折句眼，斷句於此能保留語勢頓挫

末段「覓之而遇其緒，抽之而能繼。擲而弗用，吁！誰之過與？」以連續動作寫出由尋得、承接到棄置的落差。「覓之」是尋其端緒，「抽之」是抽繹而繼續之，「擲而弗用」則轉為被棄不用。此處悲感源於所學雖可尋得其緒、亦似可繼，卻終未必能在現實中獲得施展。末句：「誰之過與？」以問語收束，將責任歸屬懸置起來：是學問不合於時，抑或時世不能用其學？祝允明未給出明確答案，而將此一不確定性保留在問句之中。由此觀之，〈悲學〉與〈悲志〉互為表裡：〈悲志〉所悲，在志向雖堅而難伸；〈悲學〉所悲，則在所學雖可承繼而未必見用。二者共同承接〈悲道〉揭示的價值根基之不明，使「道——志——學」形成由價值根基、個人志向至學問實踐的遞進。祝允明藉此將其不遇之感，從抽象的道之難明，逐步推入自身志業與所學之用的反思。

（二）身世之悲：命途困局與倫理焦慮

在〈悲道〉、〈悲志〉、〈悲學〉三篇中，祝允明已依序追問可依之道、自守之志與所學之用；至〈悲時命〉，悲感遂由價值根基與志學實踐，轉入更切近個人身世的時間與命運問題。〈悲時命〉與〈悲余先〉正構成此一轉折：前者書寫行動受阻、年歲迫近與時命不偶之感，後者則回望「余先」之德，思考自身與先德、家學承繼之間的關係。二者一外一內，分別呈現個人際遇之難伸與承繼關係之壓力，使祝允明的不遇之悲由志業層面轉入身世與倫理層面。是以下接〈悲時命〉：

旦將行游，日有食之。積囊欲貿，市闌已鍵。霽暄無營兩號駕，白日犇走坐長夜。
九門穿達，我行其野。雖有明日，吾趾壯否？亦厲之而已乎！²²

〈悲時命〉書寫祝允明面對現實阻隔，與年歲迫近時的無力感。篇首「旦將行游，日有食之。」以欲行而遇日食起筆，行動甫啟即遭遮蔽，可視為前路不明的象徵。「積囊欲貿，市闌已鍵。」則以欲貿而市門已閉為喻，寫出有備而無所售、有志而無所施的困局。此處不必將「囊」與「市闌」一一落實為才性與仕路，但其意象所指，確在於行動條件已具，現實機會卻已閉合。

接續「霽暄無營兩號駕，白日奔走坐長夜。」語勢由短促轉為舒展，呈現晴雨、晝夜之間的反差。白日奔走而終歸長夜，顯示作者對徒勞奔忙與時間耗損的感受。「九門穿達，我行其野。」則以都城大道與行於郊野相對，寫出自身與中心秩序之間的距離；無論此處是否指涉具體入京經驗，皆呈現身處制度邊緣的疏離感。至「雖有明日，吾趾壯否？」一

與感嘆力，故從而不改。

²²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7。

問，悲感轉入身體與年歲：明日雖仍可期，但身體是否仍能支撐，已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此即〈悲時命〉最切身之處——祝允明已意識到時間、身體與機會之間不再相互配合，悲感遂不止於單純怨命。

綜觀前四篇，可見〈七悲文〉的遞進已逐漸清楚。〈悲道〉由可依之道不明起筆，〈悲志〉轉入志向雖堅而難伸，〈悲學〉追問所學雖可承繼而未必見用，至〈悲時命〉則將此一困局落入年歲、身體與行動機會的現實層面。這四篇的鋪排，不僅是由抽象至具體的遞進，也逐步呈現祝允明如何從價值根基、個人志向、所學之用，推進到自身所處時命的反省。由此，「悲」成為他辨識自身處境的書寫線索。「志」、「學」兩篇所揭示的，是士人雖有志、有學，卻未必能在現實中獲得施展的困境。當志向與所學皆面臨難行、難用的問題，祝允明的悲感遂進一步轉向自身所承之處。於是〈悲余先〉承此而出，從先德、家學與師承關係的追索，思考自身何以承繼、又能否承繼的問題。此處的悲並非僅為個人不遇，也涉及他面對前人德業，與家學期待時的倫理壓力。下為〈悲余先〉：

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擅由、求、宰、木之科。外祖以裁成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勳充社稷，績振班序。暨以家室，重獲蘿松，迺事丈人。人倫刑範，誰有幸者，云集于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²³

〈悲余先〉以「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擅由、求、宰、木之科。」開篇，由前人德業反觀自身能否承繼。「由、求、宰、木」四人所指未必皆須落實為嚴格的孔門分類；就文勢而言，此處藉由串舉歷代以政事、言語、德行或退處見稱者，凸顯先公德業兼具仕宦、言行與自守等多重面向。若與祝顥致仕歸田的生命經驗相參照，則此處所呈現者，已不只是門第誇耀，也包含祝允明對家學與前人行誼的追念。

次句「外祖以裁成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勳充社稷，績振班序。」轉而舉其外祖徐有貞，以伊尹（B.C.1649-1549）、周公（B.C.?-1105）、房玄齡（579-648）、杜如晦（585-630）等輔相典範相擬，強調外祖曾以政事功業見重於世。「裁成輔相」與「勳充社稷」等語，皆將外祖置於治世功業的脈絡中理解。接續「暨以家室，重獲蘿松，迺事丈人。」

²³ 明·祝允明，張明晶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274。本文在〈悲余先〉此則上採張明晶之句讀，茲錄薛本差異處於此：「外祖以裁成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勳充社稷，績振班序。暨以家室，重獲蘿松。迺事丈人，人倫刑範。誰有幸者，云集于斯。」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7。張、薛本在〈悲余先〉之句讀上差異頗大。薛本分句明顯，語氣多停頓，結構近於家乘敘敘；張本則以逗點連貫諸句，使祖德、外祖、丈人之事一氣相承，情感由頌歎而轉自省，語勢更為流暢。末以「誰有幸者，云集於斯？悲夫！」相接，尤見由禮入情的遞進節奏。綜觀篇章結構與情感層次，張本較能呈現祝允明由頌祖至自問的心理轉折，故以之為主據。

則將岳丈李氏納入祝允明所承受的倫理網絡之中；「蘿松」可喻其節操，「人倫刑範」則顯示祝允明不僅追憶血緣先人，也將姻親長者視為足以取法的倫常典範。由此可見，「余先」所指已超出宗法意義上的先祖，涵蓋祝允明生命中可供承繼與效法的前輩德業。

末段「人倫刑範，誰有幸者，云集於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以連續詰問收束，語意由追述前人轉為反觀自身。「誰有幸者，云集於斯。」並非單純誇示家門之盛，而是感嘆自己身處多重德業交會之中，因而更須面對能否肖似、能否振起的追問：「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四問將承繼問題推至自身：面對先公、外祖與丈人所構成的倫理標準，祝允明所悲者，不只是個人遭際之不偶，也包括自身是否足以承接前人德業的不安。

若以祝允明生平觀之，《祝允明年譜》載：「天順八年（1464），希哲大父顯年六十，致仕歸田。及反里後，與其游者有徐有貞、劉珏（1410-1472）、杜瓊（1396-1474）、沈周（1427-1509）等。」²⁴其祖父祝顯歸鄉後，確與外祖徐有貞、沈周等文士並遊於吳中。此一仕宦經歷、家族教養與吳中文藝交遊交錯的環境，構成祝允明早年受教的重要背景。祝允明〈述行言情詩五十首〉其二十二亦言：「昔在杖膝下，拊頂稱佳兒……所企自有立，名位豈足期。」²⁵足見他對祖父教誨與期許懷有深切記憶。〈悲余先〉正可置於此一背景下理解：它不只是追述祖德，更藉先公、外祖與丈人之德，反思自身如何面對前人所留下的倫理期待。

整體而言，〈悲余先〉使〈七悲文〉由前文的道、志、學與時命問題，轉入承繼關係的反省。祝允明追述前人德業後，進而提出「肖／弗肖」「振／弗振」的自問，顯示其悲感已不僅關乎仕途受阻，也涉及能否承接家學、先德與倫常標準的壓力。此一轉折使「悲」由個人身世之感，進一步深入倫理層面的自我審視，並為後文〈悲黨〉對同道與精神歸屬的追尋預作鋪墊。

（三）同道與文章之悲：精神歸屬的尋索

〈悲余先〉使祝允明由個人身世，轉入承繼關係的反省；至〈悲黨〉，問題則由「何以承先」推向「誰可與同」。前文所見，祝允明面對先公、外祖與丈人等前輩德業時，反覆追問自身能否「肖」、能否「振」；而〈悲黨〉則進一步追問，當現實中難以覓得相與共道者時，士人應如何重新理解「朋從」與「同道」之義。是以下接〈悲黨〉：

自古在昔，同生九區。匪今斯今，吾誰與徒？登途闐然，閉戶席滿。若夫遠追莘渭，

²⁴ 陳麥青：《祝允明年譜》，頁 13-14。

²⁵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 3，頁 49。

潛侶箕穎，班堯廷而賡歌，升孔堂而請事，衡步三古，友于諸賢，聯蜚逸鑣，分華炙簡，固亦每接言笑，互見肺肝。又何必憧憧往來，連牀執袂，而後謂之朋從者哉！

26

開篇「自古在昔，同生九區。」由古今共處天地之間說起，「匪今斯今，吾誰與徒？」則轉為對同道者的追問。此處的「黨」，不宜僅以政治朋黨理解，而更接近可與共道、可相感通者。祝允明所問的不是普通交遊之有無，而是在現實不遇與自我懷抱難伸之際，究竟何處可尋得足以相與的精神同伴。「登途闐然，閉戶席滿。」是全篇轉折所在。若向外「登途」，所見者為道路寂寥；一旦「閉戶」，回到書冊、典籍與古人所在之處，座席反而充滿。此處所寫不止於現實景象，也顯示祝允明對「黨」的尋求，已由外在交遊轉向典籍中的前賢。換言之，他重新調整「黨」的所在：不僅在現世中尋覓同道，也在古人與文章傳統中建立相與之感。下文「遠追莘渭，潛侶箕穎。」以伊尹、姜尚（B.C.?-1015）之出仕，對許由（生卒年不詳）、巢父（生卒年不詳）之高隱，並置仕與隱、出與處兩端典範。祝允明在此並未簡單擇取仕或隱之一方，而將不同典範一併納入可相與的對象之中。「班堯廷而賡歌」、「升孔堂而請事」，則寫他想像自身可與堯之門廷、孔氏門下相接；「衡步三古，友于諸賢。」更明白指出，他藉由追慕三古、親近諸賢，獲得超越現實交遊的同道感。「聯蜚逸鑣，分華炙簡。」亦可由此理解：典籍中的先賢既是被追憶的對象，也成為祝允明重新安置自身的精神座席。

末段「固亦每接言笑，互見肺肝。又何必憧憧往來，連牀執袂，而後謂之朋從者哉！」進一步界定「朋從」之義。真正的相與，不必限於現實往來、連牀執袂；若能在典籍與文章中相接言笑、互見肺肝，亦足以構成同道之感。由此可知，〈悲黨〉所悲不只是現實友朋之不足，而是藉此重新思考「黨」的可能形式：當現實交遊不足以安置其志時，祝允明轉向古人、典籍與文章傳統，在其中尋找可與相感的對象。由此反觀〈七悲文〉之整體構成，〈悲黨〉承接〈悲余先〉的承繼問題，由「先」之可否承接，推入「黨」之何處可尋。祝允明不再只以現實友朋為依歸，而是在古聖賢與典籍傳統中重構同道關係。此一轉折使「悲」由家族與承繼壓力，進一步轉向精神歸屬的尋索，並為終篇〈悲文章〉將歸處落在文章與經史傳統中預作鋪墊。

〈悲文章〉為〈七悲文〉的終篇。前六篇已依序追問道、志、學、時命、余先與黨，至此則回到「文章」本身，思考當士人所依之道、所守之志、所承之學與可與之同道者皆成問題時，文章是否仍可成為安置自身的位置。起句「傷哉窮也，斯文漸矣。」兼含二義：

²⁶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8。

「窮」既指身世之困，也指文章所處之困局；「漸」則寫斯文漸衰之感。祝允明在此將個人之窮與文章之衰並置，使〈悲文章〉由文運衰落之感，進一步轉入自身歸處的追問。此篇關鍵在於「高謝」、「燕許」、「曹劉」、「檀左馬班」四組詞語的句讀與意脈。惟薛維源本與張明晶本句讀差異頗大，茲列兩本以資對讀：

薛維源本

傷哉窮也！斯文漸矣。木落山澤，堅腹殘絲。敗軸高謝，委塵燕許。長眠曹劉，絕交檀左。馬班之徒，豈唯不心，并昧蔑面，余何歸乎？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²⁷

張明晶本

傷哉窮也，斯文漸矣。木落山澤，堅腹殘絲敗軸。高、謝委塵，燕、許長眠，曹、劉絕交，檀、左、馬、班之徒，豈唯不心，并昧蔑面。余何歸乎？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²⁸

兩本相較，薛本於「堅腹殘絲」、「敗軸高謝」之間斷開，遂使「高謝」、「燕許」、「曹劉」、「檀左馬班」之間的層次較不明顯；張本則將「高、謝委塵，燕、許長眠，曹、劉絕交，檀、左、馬、班之徒。」連貫為一組遞進式鋪排，較能呈現祝允明由吳中前輩文士、盛世文臣、建安文士，推至經史書寫傳統的思路。故本文從張本句讀，以便觀察此篇如何藉四組典故推展「余何歸乎」之問。首先，「高、謝委塵」可置於吳中前輩的脈絡中理解。「高、謝」並稱，本文依明初吳中文士脈絡，繫於高啟（1336-1374）與謝徽（生卒不詳）。二人同出長洲，俱以詩文見稱，且皆曾被召修《元史》。《崇禎松江府志》載：

一日，（上）召見啟與編修官謝徽俱對……擢啟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啟以年少未習理財，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遂與徽俱辭。於是賜罷，仍各賜內帑白金，給牒放還，復居青丘。啟嘗以史事為國子祭酒魏觀（1305-1374）屬官，雅相知契。及是觀守蘇，啟徙居城中，延問郡中政事得失，接見甚密。會觀得罪，連坐死。年甫三十有九。²⁹

²⁷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178。

²⁸ 明·祝允明，張明晶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274-275。

²⁹ 明·方岳貢修，明·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北京：國家圖書館，2011年），卷44，頁563-564。

又《明史·文苑一》曰：「洪武初，（啟）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³⁰此一經歷使二人成為明初吳中文士與新王朝關係中的代表性個案。高啟才名甚著，後受魏觀（1305-1374）案牽連而死；謝徽則相對淡退。若從祝允明身處吳中、又自署「吳郡」的語境觀之，「高、謝委塵」所觸及的，不只是文章名家的凋零，也包含吳中前輩才名與政治際遇交錯後所留下的文士命運感。此一開端，使〈悲文章〉首先帶有明初吳中文士面對新王朝權力時的歷史陰影。

其次，「燕、許長眠」所指，當為唐代張說（667-730，封燕國公）與蘇頲（670-727，封許國公）。《新唐書·蘇頲傳》云：「頲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時號『燕許大手筆』。」³¹二人皆以文章顯名，且曾居高位，典章制度多出其手。若「高、謝」提示文章才名在政治壓力下的委頓，那麼「燕、許」則提示另一種可能：文章之士曾可居於政事核心，使辭章與制度相互支撐。「長眠」之悲，正在於此種文章得以入政、文臣得以展布其才的局面已成追憶。祝允明舉此一組，藉其盛世文臣形象，反襯自身文章聲名與仕途位置難以相稱的處境。

再次，「曹、劉絕交」可理解為文士才性與權力秩序之間的斷裂。「劉」當指劉楨（？-217）；「曹」則未必專指曹氏某一人，而可泛指曹氏一方所代表的權力秩序。劉楨以文才著稱，然因宴飲禮節事獲罪，《三國志》載之甚詳。若參照明人對此事的轉述，更可見祝允明用此典關注的，未必只在劉楨的遭遇上，還有文士才性與權力規範之間的緊張。明人馮惟訥《古詩紀》亦載其事：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太子。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治臯（罪），減死，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魏文帝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倫。」

《詩品》曰：「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思王以下楨稱獨步。」³²

劉楨為東宮從屬，與曹氏兄弟亦多有往來，且其文才為時人所重；然而，他卻因宴飲間的禮儀爭議而獲罪幾死。馮惟訥所引《詩品》稱劉楨：「真骨凌霜，高風跨俗。」曹丕（187-226）亦推許其五言詩「妙絕時倫」，此類評語正突顯其文學人格與文章才性的高標；然而，

³⁰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 285，列傳 173「文苑一」，頁 7328。

³¹ 宋·歐陽脩：《新唐書·蘇頲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25，頁 4402。

³² 明·馮惟訥：《古詩紀》，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第 10 集（臺北：臺灣商務，1980 年），卷 26，魏第 6，頁 4b-5a。

這樣的才性與風骨仍無法免於權力禮法的從屬。由此觀之，〈悲文章〉中「曹、劉絕交」所強調者，未必在於曹氏與劉楨之間實有「絕交」事件，而在於藉建安文士處境，呈現文士才性與權力秩序之間的斷裂。相較於「燕、許」所代表的文臣得位，「曹、劉」則轉而顯示文章之才未必能為政治權力所容。至此，〈悲文章〉已由吳中前輩、盛世文臣，推進到文士才性與權力關係的緊張。

最後，「檀、左、馬、班之徒」則將文章問題推向經史書寫傳統。「檀、左」可指《檀弓》與《左傳》，「馬、班」則指司馬遷（B.C.145-86）、班固（B.C.32-92）及其《史記》、《漢書》傳統。明人胡應麟（1551-1602）曾道：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史也。³³

胡應麟以《檀弓》、《左傳》為「賢人之史」，以《史記》、《漢書》為「文人之史」；明人黃汝亨（1558-1626）亦謂《檀》、《左》「以詞蘊義」，《史記》、《漢書》「以事著詞」，並認為自司馬遷、班固上溯《檀》、《左》，可會通於《春秋》之義。³⁴據此可知，「檀、左、馬、班」在明人視野中並非單純並列人名與書名，而是兼具經義、史事與文章之法的經史書寫典範。值得注意的是，祝允明並未逕稱其為典範，而曰：「檀、左、馬、班之徒。」此處「之徒」固可作類屬之稱，指此一類經史書寫者；然與下文「豈唯不心，并味蔑面。」³⁵相連，則其語氣又非全然中性，而帶有降格與疏離之感：即使是士人傳統中足以承載義理與史筆的經史典範，在斯文衰歇的處境中，其本心仍可能不被承會，其面目亦可能遭到遮蔽。

祝允明在此將〈悲文章〉的思考由辭章名家推至經史之筆，所追問者正在於：若連足以寓義、記事、存心的書寫傳統，亦可能面臨本心不被理解、面目不復清明的困局，則文章究竟還能成為士人何種歸處？因此，「豈唯不心，并味蔑面。」不宜過度作字源推衍，而應順其文勢理解為：這一經史文章傳統不僅其本心難以被承會，其面目亦有晦暗不彰、

³³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一》（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167、169。

³⁴ 明·黃汝亨：《寓林集·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68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年），卷1，頁620-621。

³⁵ 「唯」：連詞。表示讓步關係，相當於「雖然」、「縱使」。參何建明等：《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s://pse.is/94xmkf>（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昧」：違背。參何建明等：《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s://pse.is/94xmmd>（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蔑」：輕侮之解。參何建明等：《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https://pse.is/94xmp8>（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

遭人輕忽之虞。至此，祝允明由「斯文漸矣」一路推進，所問已不只是文章名家的盛衰，而是文章傳統是否仍能使士人寄託本心、保有可辨識的面目。故其下緊接「余何歸乎？」此問乃全篇關鍵：當文士命運、文章入政、才性與權力、經史書寫傳統皆呈現衰歇或晦蔽之象時，祝允明自身究竟可歸於何處？

末段「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轉入明亮的自然意象。「餘霞」、「春塘」、「出雲」、「榮木」，等皆帶有復生與顯明之感，與前文「斯文漸矣」與「昧蔑面」形成對照。此處尚非意味文章問題已被完全解決，而是顯示祝允明在追問：「余何歸乎」之後，仍可於自然生意所映照出的文章餘光中，獲得重新觀看自身處境的可能。「煌煌乎吾目兮」之「見」，正與前文面目晦蔽相對：斯文雖衰，文章傳統雖有晦暗之感，卻仍可能在餘霞、春草、山雲、榮木之中重新呈現光明。由此觀之，〈悲文章〉並未停留於文章之盡的哀歎，而是在斯文衰歇之感中，提示文章仍可能成為祝允明安置自身的所在。

整體而言，〈悲文章〉的四組典故不只是構成一條文章史序列，也使文章傳統與士人出處問題交互呈現。從「高、謝」所牽涉的吳中前輩，到「燕、許」所代表的盛世文臣，再至「曹、劉」所呈現的文士才性與權力關係，最後歸於「檀、左、馬、班」所代表的經史書寫傳統，祝允明逐步追問文章如何承載士人的本心、際遇與歸處。「余何歸乎」正是此一追問的集中表述。終篇以明亮自然意象收束，使〈七悲文〉由前文層層悲感，轉向文章所提供的安置可能；這也使〈悲文章〉成為全篇「由悲入安」的收束之處。

三、士不遇傳統中的吳中調適語境

〈七悲文〉以七則祝允明認為不可輕忽的問題展開，其重點不在單純鋪陳個人哀感，而在透過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目，尋索自身可依循的位置。若置於士不遇書寫傳統中觀察，此文固可與屈原、賈誼以來文士面對時命不偶、才志難伸的書寫相互參照；³⁶然而，本文不擬將其理解為對屈騷或漢賦傳統的直接承襲，而是藉此說明：祝允明所面對的「不遇」，一方面承受古老的士人失遇問題，另一方面又與明代科舉遲滯及吳中文化調適方式密切相關。在此脈絡下，賈誼（B.C.200-168）〈鵬鳥賦〉尤其可作為參照：

³⁶ 臺靜農將賈誼〈鵬鳥賦〉的特質歸為政治失意下，逃入空虛，帶有黃老特徵的作品。此觀察提醒本文，追尋脈絡的祝允明，未必只追最古老之根，漢代系統下的不遇尤其相近。臺靜農：《中國文學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87-88。

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虜若深淵之靚，汎虜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³⁷

此處「天地為鑪」一喻，將個體置於造化鎔冶之中，顯示人生變化、得失進退皆有不可控的一面。賈誼由此轉入「知命不憂」之思，以理命方式消解失遇所帶來的困頓。當他援引老莊之語，以「泛若不繫之舟」³⁸自況時，其實已轉向一條「內植以安命」的方式：在變化無常的造化中尋求理之自明，以思辨達於安身。換言之，〈鵬鳥賦〉所提示者，是士人在時命不可自主之際，如何藉由思辨，將失意悲懷轉化為重新安置自身的可能。

祝允明〈七悲文〉與此雖非單純承襲關係，仍可在問題意識上相互參照。〈悲道〉云：「噫！鴻靈之解，一而萬也。繇豐趨漓，氣將人紛，世逐人移。斯秘也，其遂無完期邪？而又誰其停之乎？」此處同樣由氣化流變、世道人心遷移發端，呈現個體難以制止時勢推移之感；〈悲志〉云：「黃金之蹈洪鑪，百鍊不屈。」³⁹進一步指出士人雖經磨礪，仍須確認其志向是否能夠自守。二者皆顯示祝允明在面對自身不遇時，嘗試將個人處境放入更大的時命與價值秩序中理解，而不止於怨憤。

祝允明與賈誼的差異亦在此顯現，賈誼以理命自安，將個體得失放回天地大化；祝允明則在〈七悲文〉中透過七則關目的鋪排，整理自身與科舉、年歲、先德、同道及文章傳統之間的關係。〈七悲文〉所呈現的，已不只是「知命不憂」式的理命安頓，也是在長期應試、久困春官與赴選前後的處境中，藉文章書寫重新辨識自身位置。屈原、賈誼以來的士不遇書寫，提供了祝允明理解失遇的思想資源；而〈七悲文〉真正值得注意之處，正在於它如何將此一古老命題轉入明代吳中士人面對科舉遲滯時的自我調適。

確認〈七悲文〉與屈、賈以來的士不遇書寫之間的參照關係後，仍須進一步回到祝允明自身的生命情境。其不遇不只是單純政治失勢或一般性的才志不伸，更是中舉後長期未能進士及第，並在文藝聲名已著、制度位置未定之間所形成的身分壓力。吳中文化語境所提供的調適方式，遂成為理解〈七悲文〉的重要背景。

³⁷ 此處之「保」亦通「寶」。漢·賈誼著，王洲明、徐超校註：《賈誼集校注·鵬鳥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418-419。

³⁸ 《莊子·列御寇》：「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教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教遊者也。」戰國·莊子著，王叔岷撰：《莊子校註》，頁1252-1253。

³⁹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9「七悲文」，頁176-177。

(一) 對科舉意義的辯證：〈七悲文〉於祝允明作品中的定位

〈七悲文〉雖無明確繫年，但其所關照的「不遇」主旨，與正德九年（1514）祝允明五十五歲前後一系列涉及科舉進退、年歲壓力與赴選心境的作品互相照映，本文故而將之置於此一生命關節中理解。當年，祝允明的實際行動是「棄舉赴選」——放棄繼續追求進士及第，改由謁選方式正式進入仕宦體系。此舉固然與其子祝續登第後的家族情境有關，然亦不能僅視為順應親情或宗族期待的行動；從其前後作品觀之，長年「志未酬、名未立」的積鬱、年歲迫近的壓力，以及對「是否仍須經由進士途徑定身」的反覆思索，皆構成其轉向赴選的重要背景。此際諸作，如〈述行言情詩五十首〉等，便屢屢流露對功名進退的猶疑與重估，可見祝允明對科舉取仕的理解已出現層次變化：一方面承認自己已難再承受會試之勞，另一方面又嘗試重新確認縣令之職是否仍可成為實踐抱負的途徑。

若由〈七悲文〉所呈現的篇章遞進觀之，其重點並非棄絕仕途，而是解除對進士功名的單一依附。此文透過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目的鋪排，使祝允明得以重新辨識自身與科舉、家族倫理、同道關係及文章傳統之間的位置。正因如此，當他在正德九年前後轉向赴選時，此舉便不宜僅被理解為科舉失敗後的退而求其次，或宗族責任的補償，而可視為他在長期會試不第後，重新賦予入仕道路意義的一種選擇。若科舉僅被理解為宗族任務，那麼祝續既已登第，祝允明大可視為家族期待已有所交代；然而，觀其赴選前後諸作，仍可見他對入仕懷有相當期許，並試圖在「不能再以進士功名定身」的情況下，為自身理想與才具尋找新的實踐位置。如〈壬申閏五月廿六日曉紀懷〉云：

龐葛空聞有鳳姿，仲謀聊可道佳兒。病身日對干戈臥，別淚時看尺素垂。半夜雞聲猶慷慨，平生驥足竟驅馳。無因便把漁竿去，羞向斜陽弄鬢絲。⁴⁰

「龐葛」當指龐統（179-214）與諸葛亮（181-234）。⁴¹龐統有「鳳雛」之稱，諸葛亮則以「臥龍」著名，二人並舉，構成三國奇才之典型；詩中「空聞有鳳姿」尤偏重龐統才具早著而未及充分展布的一面。與之相對，「仲謀」即孫權（182-252）⁴²，為史書中著名賢子

⁴⁰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6，頁102。

⁴¹ 據《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可知龐統與諸葛亮並列於襄陽名士品評脈絡中，故「龐葛」當指龐統、諸葛亮並稱；詩中「鳳姿」則尤扣龐統「鳳雛」之稱。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37，蜀書7，頁953-954。

⁴² 據《三國志·吳書》載：「公見（曹操，155-220）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劉表，142-208）兒子若豚犬耳！』」晉·陳壽撰，宋·裴松之註：《三國志》，卷47，吳書8，頁292。

形象。祝允明借此二句形成對照：一方面以被光芒掩蓋的龐統自況其志業未伸，另一方面又以孫權之典牽出其子祝續登第後，自己作為父親的複雜感受。換言之，此處並非單純稱羨古人，而是在「自身才志未展」與「兒子已可稱道」之間，寫出其面對功名與家族成就時的矛盾心境。祝允明在老病之軀下，對著胸中「干戈」，深感自己久無施展抱負之地；「別淚時看尺素垂」之句，亦映照他在親情與責任間的心緒交纏。半夜雞聲激起其猶存的慷慨之氣，但「無因便把漁竿去」又顯示他自覺尚不足以遽然歸隱；至「羞向斜陽弄鬢絲」，則道出年歲逼迫與理想遲滯交加的困境。此作展露祝允明面對半生科舉的深切自疑：一方面仍渴望施展其「驥足」，另一方面又深恐時序不待。若再審視其赴選道途上的作品，便可發現他對此一決定的情感姿態，已逐漸由猶疑轉向自我說服。諸如〈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

秉策志渥丹，牽絲及班艾。拜寵北闕下，寄命南嶠外。……劉公存社稷，雅尚幸終會。（余弱壯求仕，夙願為令長。今幸如志，深與言志符合）⁴³

決意赴選後，祝允明獲授廣東興寧知縣一職。該作中「秉策」寫其奉命赴官，「渥丹」則見其志意殷切而鮮明；既持策書，亦懷忠誠。至「牽絲及班艾」一語，則以「班」、「艾」指向斑白老年，⁴⁴映照其赴任時年歲已高，遂形成志氣未衰與身體漸老之間的張力。「北闕」指京師受命，「南嶠」則指南下赴任之途。祝允明以「寄命」形容赴任，顯示他並非僅將此職視為權宜之計，而是將其視為晚年仍可寄託志業之處；尤其詩下注云：「余弱壯求仕，夙願為令長。今幸如志，深與言志符合。」更明確說明縣令之職在其志願之內。又：「劉公存社稷，雅尚幸終會。」乃認同漢代劉梁不以小縣而輕社稷之志，反映祝允明自視所任雖小，仍屬國家政務之一端。⁴⁵由此觀之，此作不僅展露祝允明積極赴任之意，也呈現其在壯志與年歲並存之際，重新理解地方官職意義的努力。相近時期的赴選作〈五十服官政效白公〉，則更具體揭示祝允明對生命階段的體認。此作從「五十服官」寫至「六十熟仕」、「七十致政」，顯示他正在為自身「衰年始仕」尋求一套可安置的時間論述與身分定位：

五十服官政，六十方熟仕。七十乃致政，古今固一致。吾年五十五，始受一縣寄。

⁴³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4，頁63。

⁴⁴ 「叟、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叟，或謂之艾。」漢·揚雄撰，華學誠撰集：《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24年），卷6，頁326-327。

⁴⁵ 「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80下，文苑列傳第70下，頁684。

七里劇彈丸，亦有社稷置。夙懷同劉君，（後漢劉梁）今此幸諧志。所憂脚本短，時彫虞易躓。祗應盡素衷，玄鑒不可悖。一區石湖水，漁舟早相伺。⁴⁶

此作以人生年齡階段為序，建立祝允明對「服官——熟仕——致政」的時間理解。50 始服官政，60 方能熟習仕宦，70 乃可致政，構成一套由入仕、熟仕到退仕的生命節奏。祝允明自言「吾年五十五，始受一縣寄。」意味自己雖已年過半百，卻仍可被安置在「服官」與「熟仕」之間，尚未全然錯失實踐政務的時間。其下以「七里劇彈丸」形容縣境雖小而政務繁劇，又云：「亦有社稷置」，指出縣令之職雖非顯位，仍是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輕忽的一環。此語充分表現他對一縣之任的認同，也與其「夙懷同劉君，今此幸諧志。」之語相互呼應，顯示祝允明並非將赴任視為單純退而求其次，而是將其納入早年志願與實際政務之間重新理解。

然而，此作中的積極姿態並未完全排除不安。「所憂脚本短，時彫虞易躓。」二句，正寫出祝允明面對始仕之遲，與年力有限時的憂慮。「脚本短」可理解為自覺根基、年力或仕宦資歷皆有所不足；「虞易躓」則直陳其恐於實際政務中有所蹉跌。面對此一不安，他以「祗應盡素衷，玄鑒不可悖。」自勉：所能為者，仍在於盡其本心，而最終成敗則有不可盡由人力支配之處。由此可見，祝允明走向赴任時仍懷有疑懼；他也正是在承認年歲、資歷與現實風險的同時，重新確認縣令之職仍可作為實踐其志的場所。

尾聯：「一區石湖水，漁舟早相伺。」則將這份時間意識推向退仕想像。石湖與漁舟並不表示祝允明此時急於歸隱，而是說明他已能將赴官與歸返同時納入生命秩序之中：既知仕宦不是終身歸宿，也不因此取消當下赴任的意義。⁴⁷在「五十服官」、「六十熟仕」、「七十致政」的時間框架下，赴選遂成為祝允明於年歲遲暮之際，仍試圖安放仕進之志、實踐之願與歸返之思的一種方式。

然而，祝允明並非一開始便能以如此平穩的姿態面向仕途。前述赴選諸作所展現的，是他在 55 歲前後決定轉向赴選入仕後，逐漸形成的自我調適；在此決策達成之前，他曾經歷長期的猶疑、反覆與自我辯證。也正是在棄考與赴選之間的拉扯中，「士不遇」的體驗被深化為其生命中的核心課題。當祝允明萌生棄考之念時，此事在其交遊圈中傳開，他遂以書牘形式回覆諸友勸說。在這些書信中，他對自身放棄繼續追求進士及第的理由作出層次分明的辯解。其中，與施儒（1478-1539，正德六年進士）⁴⁸往返的〈答人勸試甲科書〉，

⁴⁶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 4，頁 63。

⁴⁷ 祝允明此處埋藏「吳中」故鄉的致仕或退隱的想像，可說是吳中地區「隱而寓居」的典型表徵，雖任仍懷隱，以文化審美的空間作為中介的精神緩衝。

⁴⁸ 該信內容並未明言敘述對象，但據《年譜》所考，祝允明該年〈與施聘之僉憲〉中曰：「當勸試之舉，執事將成就僕之心何心也，此當雕肝琢腸……。」為施儒的可能性最大。陳麥青：《祝允明年譜》，

雖非篇幅最詳，卻最貼近其決定棄考的關鍵時刻，因而尤值得重探。以下將分其主旨詳述：

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榮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勸也。……天下之務，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無方，得之而不易行，則竟亦空耳，何以徒勞為哉？求甲科之方，所業是也。今僕於是，誠不能矣。漫讀程文，味若咀蠟，拈筆試為，手若操棘，則安能與諸英角逐乎？挾良貨而往者，紛紜之場，恒十失九，況枵橐鈍手，本無所持，烏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後定也。又況年往氣瘁，支體易疲，寒辰促晷，安能任此劇勞哉？窗几摹製，尤恐弗協時格，矧於苟且求畢，寧能起觀，勞而罔功，何必強勉？此所謂求之之無方也。⁴⁹

祝允明在〈答人勸試甲科書〉開篇即承認：「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榮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官職愈居要地，固然愈能開展其志，這是眾人皆知、無須再勸之理。然而，他隨即將問題轉向「求」與「行」的關係：「天下之務，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功名的意義不只在於取得名位，更在於取得之後能否真正施行其志。若求之無方，或得之後不易行其所志，則終究只是徒勞。由此可知，祝允明此時反思的核心，已不只是「是否應再求甲科」的取捨，而是重新判斷「甲科是否仍能作為實踐其志的有效途徑」。

在此邏輯下，他明確指出自己於求甲科一事已「誠不能矣」。讀程文「味若咀蠟」，拈筆應試「手若操棘」，皆鮮明呈現他對制藝應試的厭倦與身心疲憊。原本應是求取甲科之「方」的程文與試筆，此時反而成為難以忍受的負擔。祝允明又以「枵橐鈍手，本無所持。」自況，說明自己面對「諸英角逐」的考場，已無足以取勝的把握；此處固有自謙之辭，卻也真切呈現長期應試者在年歲、體力與考場規格之間所感受到的壓力。所謂「求之無方」，並非單純意志薄弱，而是他判斷繼續循會試途徑，已難有效通往其所欲實踐之志。

（二）士不遇書寫的傳統資源與吳中調適

中國士人「士不遇」的書寫，自屈原以降即成為文學史中反覆被召喚的精神資源。其內涵既關涉政治理想無從伸展，也涉及士人面對時命、權力與評價體系時，如何重新理解自身價值。顏崑陽指出，「悲士不遇」並非單純情緒宣洩，而是一種以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為核心的心靈模式；其關鍵在於士人主體價值與外在評價、制度回饋之間是否相稱。屈原形象之所以成為後世文人反覆援引的典範，正在於司馬遷所謂：「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頁 118。施儒資訊參自美·包弼德等：《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 <https://psc.is/94vjln>（美國：哈佛大學，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

⁴⁹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 12，頁 222。

能無怨乎？」已將其塑造成忠信不遇、人格受抑而仍須自明其志的士人範型。⁵⁰

顏氏進一步指出，漢代文人反覆召喚屈原，已不只是重述屈原之遭遇，也是在大一統帝國形成後，藉此處理個體才志、政治權力與時命不可控之間的緊張。換言之，屈原所代表的悲感，在漢代文人筆下已由對時世失序的憂憤，轉入才志無所伸、忠信不被理解的自我感受。本文據此理解：「悲世」與「悲己」並非截然分屬不同時代的兩個階段，而是士不遇書寫中可相互交疊的兩種重心：前者強調政治理想與時世失序，後者則凸顯士人自我價值，與外在回應不相稱所引發的悲感。至科舉制度成熟後，此一悲感又更常與功名進退、制度位置及生命時間壓力相互結合，形成祝允明這類中舉後久困春官者所面對的特殊問題。

若顏崑陽著重揭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鄭毓瑜對「擬騷與對問賦」傳統的研究，則進一步說明屈原式發聲，如何在漢晉文學實踐中被反覆演練。漢代文人不僅以屈原自傷身世，也透過擬騷、對問等形式將直諫、被棄與自明其志的姿態轉化為可書寫、可再現的語言形式。⁵¹由此可見，士不遇既是遭遇失意後的表述，也成為文人藉由書寫整理自身位置、建立道德姿態的一種方式。漢代以降逐漸典範化的「士不遇」，成為士人書寫中可複製、可承繼的精神語法。然而，若僅從此一語法理解明中葉士人的生命反應，仍不足以說明祝允明所處的吳中語境。「哀其不遇」固然已是自我認識與抒情的重要方式；當此一書寫傳統進入明代吳中後，其意義更與地方文藝生活、交遊網絡、書畫活動，以及仕隱之間的調適方式相互結合。士人因此得以在制度位置未定或仕途受阻之際，仍透過文藝聲名與地方文化資源維持自我價值。

嚴迪昌指出，吳中士人素具鮮明的地域自覺。他們在描繪自身或同地文士時，往往反覆構築「何為吳」的框架；此種敘述，一方面承繼世族傳統所推崇的「從容」氣度，一方面又藉由文會、雅集、書畫評品等公共文化場域加以強化。此類活動並非單純退避塵世，而是在詩文、書畫與交遊之間，形成士人維繫聲名與自我價值的文化空間。換言之，面對政權強勢與科舉延宕所造成的壓力，吳中文士未必只能以悲嘆應對；他們亦可在仕途之外，透過文藝活動與地方交遊保存其文化身分，使士不遇之感獲得較具彈性的調適方式。

吳中地域自覺使士不遇在此地不僅是既有的抒情語法，也能與地方文藝生活結合，成為可被調節與轉化的處境經驗。吳中文士多能在文藝活動與地方公共場域中維繫名望，使「不仕」不必直接等同於自我價值的失落。然而，這種既能與仕途保持距離、又能自立於文化場域的姿態，是在既有歷史前提下的文化現象。元末明初的政治斷裂，尤其朱元璋

⁵⁰ 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頁 210、215-217、222。

⁵¹ 鄭毓瑜：〈直諫形式與知識分子——漢晉辭賦的擬騷、對問系列〉，《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6 期（2000 年 3 月），頁 174-176。

(1328-1398) 統一後對江南士人的壓力，使吳中文士更早意識到出仕與政權之間可能存在的風險。高啟等名士便在此背景下，形成對仕隱進退的審慎思考：

夫魚潛於淵，獸潛於藪，常也。士而潛於野，豈常也哉？蓋潛非君子之所欲也，不得已焉爾。當時泰，則行其道以膏澤於人民，端冕委佩，立於廟朝之上，光寵烜赫，為眾之所具仰，而潛云乎哉？時否，故全其道以自樂，耦耒耜之夫，謝干旄之使，匿耀伏跡於畎畝之間，唯恐世之知己也，而顯云乎哉？故君子之潛於野者，時也，非常也。⁵²

高啟以「魚潛於淵，獸潛於藪。」喻士人之仕隱抉擇，指出士人之出處須因時勢而定。時治則宜出，得以行其道而施澤於民；時否則宜退，藉由藏跡畎畝以保全其道。此種理解將「隱」視為不得已時的處世方式，而非先驗的終極選擇。正如嚴迪昌所言，高啟的思想「基本仍是大用於天下的忠愛觀」；即使退隱，也未必否定再出的可能，儒家入世理想仍是其仕隱判斷的重要前提。⁵³

然而，明初政治壓力與高啟等人的遭遇，使吳中文士對「隱」的理解逐漸增添避禍與自保的意味。此一「隱」雖仍存有再入仕途的可能，卻已不只是「待時而動」的權宜，也包含面對現實權力時保持距離的考量。祝允明在〈七悲文·悲文章〉以「高、謝委塵」⁵⁴追憶吳中前輩，所悲不僅在其才名委落，也在於政治牽累如何使文士才名難以自全。對吳中文人而言，出仕遂不再只是通往功名與行道的途徑，也可能伴隨風險；「不仕」因而成為可以被理解的另一種選擇。換言之，當地方文化自覺遭遇新王朝權力壓力時，吳中之隱便不僅是文雅性情的表現，也帶有對權力保持距離、保存自身位置的意味。

黃卓越指出，入明以後的吳中文士在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下，並未回到單純以「再出」為終點的退隱思考，而是形成一種介於仕進與隱退之間的中間狀態。即使如祝允明，明顯懷抱仕宦焦慮，仍在得官後迅速生起急流勇退之意；其狀態介於離仕與仕宦之間，並藉由詩文、雅集與交遊維持其文化在場。黃氏將此結構稱為「隱寓性」：其重點不在以山林為終局，而在以書寫與文藝活動作為生命延續與自我價值維持的方式。⁵⁵換言之，「隱」在此不必然意味退出仕途，也可理解為對仕途保持審慎距離；「寓」則指向一種介於仕與隱之間、尚未作出決絕選擇的中介狀態。此一概念有助於說明明中葉吳中文士如何在不遇之際，

⁵² 明·高啟：〈野潛稿序〉，收入清·盧文弨輯：《常郡八邑藝文志》，卷5，頁33-34。見 Internet Archive <https://pse.is/94xq46>（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

⁵³ 嚴迪昌：《嚴迪昌自選論文集》（北京：中國書店，2005年），頁295-296。

⁵⁴ 明·祝允明，張明晶點校：《祝允明集》，卷9，頁274-275。

⁵⁵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頁106。

仍透過詩文、書畫、交遊與地方聲望維持自我價值：他們雖未完全撤離仕途秩序，卻已在仕途之外保有可供自我安置的文化空間。

若將「隱寓性」的論證推向個體生命層面，都軼倫進一步指出，明中期吳中文人多處於仕與隱之間的懸置狀態；其人未必決絕棄仕，卻也未必能全然投身試場，科舉遂可能成為一種漫長而難以終止的生命負荷。此一觀察有助於理解祝允明的處境：多年會試不第，使「是否繼續追求進士及第」成為他生命中持續存在的壓力；而正德九年前後轉向赴選，則使他得以暫時結束長期應試的循環，重新思考入仕、歸返與自我安置之間的關係。

此一機制在祝允明赴選前後作品中尤為清楚。他一方面備任入仕，確認縣令之職仍可承載其早年志願；另一方面又反覆書寫歸返吳中的可能，如〈五十服官政效白公〉所言「一區石湖水，漁舟早相伺。」⁵⁶此句所呈現者並非單純敗退，也不是急於歸隱，而是將赴官與歸返同時納入生命秩序之中。對祝允明而言，赴選不只是科舉失利後的補救，也不是完全放棄仕途的宣告；它更可被理解為在進士功名已難再求的情況下，重新安排仕進實踐與歸返想像的一種方式。正是在此意義上，吳中文化語境提供了較具彈性的調適條件：士人即使未能透過進士及第取得理想中的制度位置，仍可藉由地方聲望、文藝活動、書寫實踐與歸返想像，維持其自我價值。

綜觀前述，士不遇在吳中不只是被動沿襲既有的抒情語法，也在明初以來的政治記憶、地方文藝生活與科舉制度壓力中，形成較具彈性的調適方式。祝允明〈七悲文〉所展現的，正是此一脈絡中的個案：它一方面承接屈原、賈誼以來士不遇書寫中才志難伸、時命不偶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又在吳中文化語境中，透過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目的鋪排，將長期科舉遲滯所造成的身分壓力，轉化為文章中的自我辨識與安置。由此可見，本文所謂「吳中士不遇書寫」，重點不在建立一套固定的地域性悲感，而在說明祝允明如何借助吳中文化所提供的文藝、交遊與歸返資源，為其不遇經驗尋得較可持續的書寫位置。

四、結語：〈七悲文〉的由悲入安

綜合前文可知，〈七悲文〉雖以「悲」為名，卻並非單純的晚年失意自況。祝允明在卷頭語中先辨明，其所書之悲不在爵位、財貨之私，而在道、志、學、時命、余先、黨與文章等關涉士人自我位置的重大問題。由此展開的七篇文字，遂形成一組由悲入安的篇章

⁵⁶ 明·祝允明，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卷4，頁63。

次第：其悲感不止於情緒抒發，而是祝允明在中舉後久困春官、至正德九年前後轉向赴選之際，重新辨識自身與科舉、家族倫理、同道關係，及文章傳統之間位置的書寫過程。

就精神層面而言，〈悲道〉、〈悲志〉、〈悲學〉與〈悲時命〉依序展開祝允明對價值根基、個人志向、所學之用與時命年歲的反省。〈悲道〉所問者，是可依之道在諸學分流、世道人心遷變之際何以不明；〈悲志〉所悲者，則是志向雖堅而難以伸展；〈悲學〉進一步追問所學雖可承繼，卻未必能在現實中見用；至〈悲時命〉，此一困局落入年歲、身體與行動機會的現實層面。這四篇使祝允明的不遇之感，不再只是功名失落，而成為對自身志業能否實踐的連續追問。

就倫理層面而言，〈悲余先〉與〈悲黨〉使此一追問由個人身世轉入承繼關係與同道尋索。〈悲余先〉透過先公、外祖與丈人等前輩德業，追問自身能否「肖」、能否「振」，顯示祝允明所承受的不只是科舉失意，也包括面對家學、先德與倫常標準時的倫理壓力。〈悲黨〉則進一步將「同道」之義由現實交遊轉向古人、典籍與文章傳統：當外在尋求同道而感到道路寂寥時，閉戶讀書反見「席滿」，祝允明遂在古聖賢與經典書寫中重新理解「朋從」的可能形式。

就文章層面而言，終篇〈悲文章〉將前六篇所累積的追問集中於「余何歸乎」一語。本文將「高謝」、「燕許」、「曹劉」、「檀左馬班」四組詞語視為一組遞進式鋪排：由吳中前輩文士與政治際遇，至盛世文臣與文章入政，再至文士才性與權力秩序的緊張，最後推至經史書寫傳統之本心，與面目是否仍能被指認、承繼的問題。由此可知，〈悲文章〉並非單純哀悼文章衰微，而是在斯文衰歇感中追問，文章是否仍能為士人安置自身的載體。該文末段：「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所轉入的明亮自然意象，正提示祝允明在層層悲感之後，仍於文章中覓得己身的立足點，並於自然生意中看見可安置自身的可能。

因此，本文所謂「由悲入安」，並非指祝允明已完全消解科舉挫折，也不是說他由此取得圓滿的精神超越；而是指〈七悲文〉透過七則悲感的次第展開，使祝允明得以將長期會試不第、年歲迫近與赴選轉向所形成的身分壓力，整理為一組可被書寫、可被理解的自我辨識過程。其「安」不在外在處境的穩定，而在文章中重新安排自身與科舉、先德、同道及文章傳統的關係。由此亦可進一步理解祝允明創作中常見的曲折回返之勢：其作品往往不以單一決斷或終點為目的，而作為創作者反覆辨析自身處境的書寫載體。祝允明常在仕與隱、進與退、功名與文章之間往返思索，藉由書寫重估自身位置。〈七悲文〉正集中呈現此一特徵：它先由道、志、學之不明與難行，轉入時命、先德與同道的重估，最後再回到文章本身，形成一種由外在失遇轉入內在整理，又由內在整理回應現實行動的思索路徑。此種回返不宜視為論述游移，而是祝允明在長期科舉遲滯與吳中文化語境中，持續尋

找可行位置的書寫方式；亦由此可見，〈七悲文〉對理解祝允明成組作品中的自我辯證與結構經營，具有重要意義。

此一理解亦有助於重新說明〈七悲文〉在明代吳中士不遇書寫中的意義。祝允明並未單純重複屈原、賈誼以來的士不遇哀怨，也未直接退入山林以否定仕途；他是在明中葉吳中文化語境中，借助地方文藝生活、古人典範、交遊網絡與文章傳統，為長期科舉遲滯所造成的身分懸置尋找書寫中的安置方式。這也呼應羅時進的觀察：「明人對於鄉前輩與地域特質的認同，已是經久的地域傳統，是較之全國風行傳統更為古老也深厚的地域小傳統；無論文學還是歷史的書寫，地區作為群體認識世界的範疇，幾乎等同時思考的出發點。」⁵⁷地方於是成為文士理解自身的重要座標；對祝允明而言，吳中不只是可歸之地，也是一套能使其在科舉遲滯中維持文化身分與自我價值的調適語境。

由此觀之，〈七悲文〉的價值不僅在於保存祝允明晚年心境，更在於具體呈現一位名重吳中而久困春官的文士，如何在棄舉赴選前後，將「不遇」所造成的自我懷疑，轉化為對科舉、家族倫理、同道關係與文章傳統的重新安排。本文因而得以補足既有研究較少專論〈七悲文〉之不足，並進一步指出：明代吳中士不遇書寫的特殊性，不在於單純哀嘆功名失落，而在於士人能夠藉由地方文化、文藝交遊與文章書寫，為制度位置未定的生命狀態尋得可持續的自我位置。祝允明〈七悲文〉正是在此意義上，展現其「由悲入安」的篇章力量與文學史意義。

⁵⁷ 羅時進：《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80。

徵引文獻

古籍

- 戰國·莊子 ZHUANG, ZI 著，王叔岷 WANG, SHU-MIN 撰：《莊子校詮》*Zhuang Zi Jiao Xuan*（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88 年）。
- 漢·揚雄 YANG, XIONG 撰，華學誠 HUA, XUE-CHENG 撰集：《揚雄方言校釋匯證》*Yang Xiong Fang Yan Jiao Shi Hui Z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24 年）。
- 漢·賈誼 JIA, YI 著，王洲明 WANG, ZHOU-MING、徐超 XU, CHAO 校註：《賈誼集校注·鵬鳥賦》*Jia Yi Ji Jiao Zhu Fu Niao F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6 年）。
- 晉·陳壽 CHEN, SHOU 撰，宋·裴松之 PEI, SONG-ZHI 註：《三國志》*San Guo 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劉宋·范曄 FAN, YE 撰，唐·李賢 LI, XIAN 等註：《後漢書》*Hou 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宋·洪興祖 HONG, XING-ZU：《楚辭補注·離騷》*Chu Ci Bu Zhu Li Sao*（臺北 Taipei：頂淵文化 Dingyuan Culture，2005 年）。
- 宋·歐陽脩 OUYANG, XIU：《新唐書·蘇頌傳》*Xin Tang Shu Su Ting C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明·方岳貢 FANG, YUE-GONG 修，明·陳繼儒 CHEN, JI-RU 纂：《崇禎松江府志》*Chong Zhen Song Jiang Fu Zhi*（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11 年）。
- 明·胡應麟 HU, YING-LIN：《少室山房筆叢·史書佔畢一》*Shao Shi Shan Fang Bi Cong Shi Shu Zhan Bi Y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58 年）。
- 明·祝允明 ZHU, YUN-MING：《祝子志怪錄》*Zhu Zi Zhi Guai Lu*（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Thread-bound Book Publishing House，2003 年）。
- 明·祝允明 ZHU, YUN-MING 著，薛維源 XUE, WEI-YUAN 點校：《祝允明集》*Zhu Yun Mi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6 年）。
- 明·祝允明 ZHU, YUN-MING 著，張明晶 ZHANG, MING-JING 點校：《祝允明集》*Zhu Yun Ming Ji*（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23 年）。
- 明·高啟 GAO, QI：〈野潛稿序〉“Ye Qian Gao Xu”，收入清·盧文弨 LU, WEN-CHAO：《常郡八邑藝文志》*Chang Jun Ba Yi Yi Wen Zhi*。見 Internet Archive <https://pse.is/94xq46>（北京 Beijing：

- 北京大學圖書館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最後瀏覽日期: 2026.05.25)。
- 明·黃汝亨 HUANG, RU-HENG: 《寓林集·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序》*Yu Lin Ji Er Shi Yi Shi Lun Zan Ji Yao Xu*,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Xu Xiu Si Ku Quan Shu Ji Bu* 第 1368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年)。
- 明·馮惟訥 FENG, WEI-NE: 《古詩紀》*Gu Shi Ji*, 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 《四庫全書珍本》*Si Ku Quan Shu Zhen Ben* 第 10 集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0 年)。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編: 《明史》*Ming 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年)。

近人論著

- 王征 WANG, ZHENG: 〈明中葉吳中派隱逸風尚與陶詩接受——以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為中心〉“Ming Zhong Ye Wu Zhong Pai Yin Yi Feng Shang yu Tao Shi Jie Shou: Yi Shen Zhou, Zhu Yun Ming, Wen Zheng Ming Wei Zhong Xin”,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第 36 卷第 6 期 (2019 年 6 月), 頁 37-44、76。
- 何建明 HE, JIAN-MING 等: 《國際電腦漢字及異體字知識庫》*Guo Ji Dian Nao Han Zi Ji Yi Ti Zi Zhi Shi Ku* <https://chardb.iis.sinica.edu.tw/>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最後瀏覽日期: 2026.05.25)。
- 范宜如 FAN, YI-RU: 《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Yi Ge Di Yu Wen Xue de Kao Cha: Ming Dai Zhong Qi Wu Zhong Wen Tan Yan Jiu* (臺北 Taipei: 萬卷樓圖書公司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 2024 年)。
- 徐慧 XU, HUI: 〈從祝允明詩歌創作看其仕隱觀的轉變〉“Cong Zhu Yun Ming Shi Ge Chuang Zuo Kan Qi Shi Yin Guan de Zhuan Bian”, 《中國韻文學刊》*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 第 23 卷第 2 期 (2009 年 2 月), 頁 19-26。
- 徐慧 XU, HUI: 《祝允明文學思想研究》*Zhu Yun Ming Wen Xue Si Xiang Yan Jiu* (鄭州 Zhengzhou: 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年)。
- 都軼倫 DU, YI-LUN: 〈矛盾、空間與解脫: 論明中期吳中文人的仕隱困境〉“Mao Dun, Kong Jian yu Jie Tuo: Lun Ming Zhong Qi Wu Zhong Wen Ren de Shi Yin Kun Jing”, 《新疆大學學報 (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 第 49 卷第 1 期（2021 年 1 月），頁 116-123。
- 閻繼翔 YAN, JI-XIANG：《撕裂的兩極：祝允明的人生與書法》*Si Lie de Liang Ji: Zhu Yun Ming de Ren Sheng yu Shu Fa*（新北 New Taipei：花木蘭文化事業 Hua Mulan Culture Publishing，2018 年）。
- 陳麥青 CHEN, MAI-QING：《祝允明年譜》*Zhu Yun Ming Nian Pu*（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 黃卓越 HUANG, ZHUO-YUE：《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Ming Zhong Hou Qi Wen Xue Si Xiang Yan Ji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年）。
- 廖棟樑 LIAO, DONG-LIANG：〈痛飲酒、熟讀〈離騷〉——簡論六朝士人對屈原的讀解〉“Tong Yin Jiu, Shu Du ‘Li Sao’: Jian Lun Liu Chao Shi Ren dui Qu Yuan de Du Jie”，《中國文哲研究通訊》*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8 卷第 4 期（1998 年 12 月），頁 67-78。DOI：10.30103/NICLP.199812.0004。
- 臺靜農 TAI, JING-NONG：《中國文學史》*Zhong Guo Wen Xue Shi*（臺北 Taipei：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 鄭毓瑜 ZHENG, YU-YU：〈直諫形式與知識分子——漢晉辭賦的擬騷、對問系列〉“Zhi Jian Xing Shi yu Zhi Shi Fen Zi: Han Jin Ci Fu de Ni Sao, Dui Wen Xi Lie”，《中國文哲研究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第 16 期（2000 年 3 月），頁 151-212。DOI：10.6351/BICLP.200003.0151。
- 顏崑陽 YAN, KUN-YANG：〈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Lun Han Dai Wen Ren ‘Bei Shi Bu Yu’ de Xin Ling Mo Shi”，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Han Dai Wen Xue yu Si Xiang Xue Shu Yan Tao Hui Lun Wen Ji*（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Press，1991 年），頁 209-254。
- 羅宗強 LUO, ZONG-QIANG：《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Ming Dai Hou Qi Shi Ren Xin Tai Yan Jiu*（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2006 年）。
- 羅時進 LUO, SHI-JIN：《文學社會學——明清詩文研究的問題與視角》*Wen Xue She Hui Xue: Ming Qing Shi Wen Yan Jiu de Wen Ti yu Shi Ji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7 年）。
- 嚴迪昌 YAN, DI-CHANG：《嚴迪昌自選論文集》*Yan Di Chang Zi Xuan Lun Wen Ji*（北京 Beijing：中國書店 China Book Press，2005 年）。
- 美·包弼德 Peter Kees Bol 等：《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https://cbdb.hsites.harvard.edu/>（美國 America：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最後瀏覽日期：2026.05.25）。

【附錄】祝允明科舉流年表

鄉 試				會 試			
編號	時間	年齡	結果	編號	時間	年齡	結果
1	成化十四年 (1479)	20	入學成為生員 ⁵⁸	1	弘治六年 (1493) 二月	34	未應試
2	成化十六年 (1480) 秋	21	不第	2	弘治九年 (1496) 春	37	不第
3	成化十九年 (1483) 秋	24	不第	3	弘治十二年 (1499) 春	40	不第
4	成化二十二年 (1486) 秋	27	不第	4	弘治十五年 (1502) 春	43	不第
	弘治二年 (1489) 秋	30	八月三日病，尋返蘇就醫，未試。	5	弘治十八年 (1505) 春	46	不第
6				正德三年 (1508) 春	49	不第	
7				正德四年 (1509)	50	作〈述行言情詩五十首〉。	
	弘治五年 (1492) 秋	33	中舉，列第 115。	8	正德六年 (1511) 春	52	不第，子祝績登進士第。
9				正德六年至九年間 (1511-1514)	〈七悲文〉創作區間		
10				正德九年 (1514) 春	55	不第，作〈答人勸試甲科書〉。秋，赴京就選，得授 廣東興寧知縣 。冬，作〈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五十服官政效白公〉。	

⁵⁸ 明·祝允明，張明晶點校：《祝允明集》，頁 2。

Wu-Region Writing of the Unrecognized Scholar in Zhu Yunming's "Seven Laments"

WANG, DA-FU*

(Received December 18, 2025 ; Accepted May 8, 2026)

Abstract

In Zhu Yunming's works, *Qibei wen* bears a pronounced autobiographical character. However, to read the text merely as an expression of late-life frustration is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ideological depth manifested in its structure and thematic progression.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Qibei wen* by situating i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in Zhu Yunming's life: his prolonged failure in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and his eventual abandonment of further examination attempts around the ninth year of the Zhengde reign, when he turned instead to official selection.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grief" in *Qibei wen* does not lie in the loss of rank or wealth. Rather, through its seven sections—grieving for the Way, aspiration, learning, fate and timing, forebears, companions, and writings—the text unfolds Zhu Yunming's questioning and reflection on the value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s, the inheritance of ancestral virtu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like-minded companions, a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This practice of writing both draws on the legacy of *sao*-style impassioned lyric expression and, through the question "Where shall I return?", transforms grief and indignation into a search for literary refuge and a repositioning of the self.

Accordingly, *Qibei we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ext for understanding Zhu Yunming's state of mind when he abandoned the examinations and turned to official selection; it also reveals how

*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u-region literati, under the prolonged stagn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sustained their sense of self-worth through local literary resources and literary writing, thereby opening another path of settlement within the tradition of Ming-dynasty writings on the unrecognized scholar.

Keywords: Zhu Yunming, *Seven Laments*, Unrecognized Scholar, Wu Region,
Examination Delay